寫作「潛規則」

梅桑榆

我早年初學寫作時，有人對我說：「搞寫作是容易的嗎？現在發稿都是靠關係！」並且鑿鑿有據地舉例：「某某在某報發表幾篇文章，請了兩場客；某某在某雜誌發表小說，不知送了多少禮品；某某獲的那個獎，全靠塞紅包……」對於此說，我當時信以爲眞，但細想之，我身居小縣城，距本省省城的報刊編輯部三百餘里，距北京與外省的編輯部更遠，這關係怎麼啦？再說我收入微薄，也沒錢請客送禮，別說送禮，連跑編輯部的車旅費都花不起。至於鬧個什麼獎，就更無門路可尋。如此一想，也就暗自否定了這種說法，堅信「功到自然成」，堅信自有編輯「慧眼識珠」，堅信只要稿子寫得好，不必拉關係！

居京多年，結識了一些正在或曾在報刊工作過的編輯，寫作者靠拉關係發稿、獲獎的故事聽得更多，且更加精彩離奇。不過以前所謂「拉關係」，現在已叫作「潛規則」。既是「規則」，也就有行內人必須遵守之意。有些地方文聯、作協的頭目，爲了發表作品，以開筆會、開講座爲名，邀請某些大報大刊的總編或編輯蒞臨，講寫作，看稿評稿，旅遊采風，窮吹胡侃，吃喝玩樂一通之後，臨行時還要塞上厚禮，於是頭目自己的大作得以出籠，地方作者的作品也沾光發表，年終總結，也就成果斐然。而那開筆會、講座的費用，或有企業贊助，或由公款報銷，等於花別人的錢爲自己買得名利，不亦快哉！某某文學獎，雖然獎金不高，但一朝獲獎，便像運動員在奧運會拿了冠軍，作者所在省均予以重獎，各省獎金十萬至數十萬不等，並可作爲問鼎地方作協、文聯主席的資本，因此鑽營者衆。一些作者，爲使作品入圍，提前請評論家撰文吹捧推薦，或是於評獎開始之前探得評委名單，然後給這些「菩薩」挨個「燒香」。請人吹捧也好，登門「上香」也罷，無不是金錢鋪路，更有送上美女者。如此評獎，結果可知，某些文學獎獲獎作品，大多在讀者中毫無影響，甚至不乏自掏腰包出版，連作者的老婆孩子與朋友都不願看的詩集、文集……

這些故事，我只能當笑話聽聽。我以寫作爲業，靠稿費養家，若靠請客送禮發表文章，在居大不易的北京，豈不只能喝西北風？我乃一介平民，靠開筆會、開講座與編輯拉關係，我既拉不到贊助，也無動用公款的權力，何況，即使有能量這麼幹，也非長久之計。我既以寫作爲業，多寫作品，寫出好作品，才是我的第一追求，至於稿費，只是勞動報酬，是「副產品」，若是只能靠耗費巨資發表幾篇文章或出版一本書，鬧點虛名，不管花誰的錢，對我來說都是一種恥辱，因爲這證明我沒有靠寫作爲生的能力。至於獲什麼文學獎，我認爲應該靠作品而不是人事去爭取。凡靠種種手段獲得的獎，不過混得一時之虛榮，其寫作水平並不會因此而提高。何況我自知沒有什麼作品有望獲得文學獎，故而一直對此漠不關心。

我一直認爲，靠拉關係成不了作家。即使靠拉關係發表了一些作品，或自費出版了一兩本書，混進了作協、文聯，也只是個空頭作家，徒有虛名而已。事實證明，好文章、好書稿不愁無處發表出版，因爲報刊需要發表好文章，出版社需要出版好書，以手中的發稿權招搖撞騙，撈取錢物的編輯只是少數，大部分編輯都是恪守職業道德之人。在種種「潛規則」已使某些文學獎失去公正性的今天，獲獎的作品，未必就是好作品。以某文學獎而言，若問上屆有哪些作品獲獎，恐怕文學圈子裡的人都答不上來。若眞是好作品，即使不獲獎，也不會被埋沒。而今，不靠包養、不靠任何關係，只靠寫作生存，乃至成就顯著的自由作家越來越多，便是明證。

「名著」快餐化之憂

陸地

現在的中外文學名著的各類縮寫讀物在圖書市場上比比皆是，而且內地的一些知名作家的圖書只要一上市，報刊就會馬上進行縮寫，把厚重的一本書濃縮爲幾千字的故事脈絡，慘不忍睹的呈現在讀者面前。

爲什麼要對作品進行縮寫？業內人士說這是讀者的閱讀需要。因爲現在是資訊時代，人們追求信息，要比欣賞文學本身更加迫切，縮寫讓名著和小說實現「快餐化」，以最快的速度滿足大家的需要。這種論調同樣得到了老師們的歡迎，快餐化的名著，學生是主要的消費群體。因爲學生需要閱讀大量的中外名著和熱銷的具有影響力的作品，但學生的課業負擔十分沉重，他們根本沒有更多的時間去讀原著，「縮寫」名著就是一個很好的辦法。結果，一些出版商不僅從文字上進行縮寫，而且還採用節選、改編、圖解、註釋等方式進行濃縮作品，以滿足不同的消費者群體的需求，在圖書市場上，同一本名著，可以出現了幾十種縮寫版本。

如果從學生參考學習的角度去理解，「縮寫」名著似乎可以寬容。但目前的現狀是，被縮寫的小說根本不能夠保證質量，有的歪曲了作品的本身故事，有的索性把一本小說濃縮成一篇文章作爲教案，分析起段落大意起來。

還有，現在的一些報刊大量出現的「縮寫」小說，很多無法保證小說內質，但似乎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關注。然而，就小說閱讀而言，把小說的「宏大敘事」引入到「快餐式閱讀」的做法，並不是小說審美的正途。「縮寫小說」擠掉了文化積澱，勢必造成營養缺陷，從某種意義上說，「縮寫」是對名著的「褻瀆」。這不僅對著作內容而言，從法律層面上也值得探討。

《著作權法》第十條規定，要「保護作品完整權」；第三十三條規定，對作品的修改、刪節均須經作者許可；《著作權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七條規定，允許適當引用他人作品，「僅限於介紹、評論某一作品或者說明某一問題」。而現在的「縮寫」本，把他人作品，冠以「縮寫」、「改寫」、「節寫」、「摘述」等方式，侵害了原作者的權益。

「縮寫」小說大行其道，根本原因就在於利益的驅動。而學校的一些老師，喜歡揠苗助長，這樣的閱讀，想培養學生的文化素養，就戛戛乎難矣哉了。

當樂趣遇上理想

流沙

鍾期榮，也許內地很少有人知道她的名字；香港樹仁大學，同樣很少有人知道。但是，關於鍾期榮，關於樹仁大學的故事，卻值得一聽。

鍾期榮是湖南長沙人，一九二〇年出生，她二十四歲那年在重慶參加全國高等文官考試，獲得司法組第一名，之後她成爲中國首位女法官，之後又因酷愛傳業授課，任職於許多大學，她講課十分精彩，遠近聞名。鍾期榮後來邂逅了現在的丈夫胡鴻烈，胡鴻烈則是當年文官考試外交組的第一名，兩人一見鍾情，結爲伉儷。婚後的幾十年，他們事業有成，積蓄豐厚，日子過得幸福美滿。

上個世紀四十年代，夫妻倆又留學法國。歸國後，在香港定居。一九七一年，鍾期榮退休了，本來她可以過上富足的生活。但是，她卻因爲愛極了教學，想在退休後辦一個幼稚園，在有生之年，與孩子們在一起。丈夫知道妻子這輩子最大的樂趣就是當老師，如果擁有自己的一所學校，她將無比地快樂。

鍾期榮當年成爲法官，其抱負理想就是「不爲己，但爲群，犧牲小我，達成博愛」，雖然年過半百，但這樣的理想仍然沒有改變。在丈夫的支持下，鍾期榮決定創辦一所大專學校。當親朋好友和子女得知他們想創辦大學時，都感到震驚。他們雖然生活富足，但創辦一所私立大學需要一筆不菲的啓動資金，而且不太可能得到政府的資助，尋找投資人也不是那麼容易的。

但在鍾期榮的堅持下，學校還是建起來了，當初設備簡陋，經營慘淡。但是，鍾期榮和丈夫和其他辦學人有一個非常大的不同，別人辦學可能會有利益訴求，而他們辦學，完全是爲了樂趣和理想。每天他們只要呆在學校裡，看到有學生進出，聽到教室裡書聲琅琅，就是最大的欣慰了。從上個世紀七十年代，到本世紀，足足三十餘年的辦學經歷，鍾期榮和丈夫投入了近五億元的資金，樹仁大學也從原來的小規模大專，發展成爲擁有十三個專業，二百多名教師，三千多人就學的大學。

鍾期榮把所有身家投入到辦學事業中的故事，感動了許多香港人。在民間輿論的支持下，去年樹仁學院升格爲大學。他們的故事傳到內地後，同樣感動了內地人，他們又被評爲感動中國人物。

但鍾期榮卻因爲積勞成疾，中風了。她再也不是那個精神矍鑠的老太太了，而是一個行動不便，嘴裡流着涎水，需要人照顧的老人了。爲了辦學，鍾期榮把一切都砸進去了。當中央台的記者採訪她時，她異常激動，說她的夢想成眞了，這是她一生之中最大的樂趣，也是一生之中最大的理想，上蒼已經那麼垂青她了，讓她能看到現在的一切。她不斷流下涎水，身邊的丈夫用手帕輕輕替她拭去涎水，鍾期榮和她的丈夫，一直微笑着。

李嵐清與音樂

馬莉

藝術修養對一個全面發展的人來說，是不可或缺的。具備一點音樂的才藝，可以提高人際交流的質量和效果。前國務院副總理李嵐清就曾有過三次成功的「音樂外交」。

一九九五年李嵐清出訪挪威，挪威政府爲他舉辦了盛大的歡迎晚宴。在晚宴上致辭時，李嵐清提到了易卜生和格里格，沒想到宴會的氣氛頓時活躍起來。有關兩國文化的話題不僅營造了整個晚宴的熱烈氣氛，對第二天正式會談的順利進行也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會談以後挪威副總理還臨時改變議程，親自陪同他們訪問挪威的另一個城市卑爾根。一方面是因爲這是她的家鄉，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原因是李嵐清喜歡格里格的音樂。

一九九六年，李嵐清訪問波蘭，接待他的波蘭副總理和他一樣，是個蕭邦音樂的愛好者。兩人之間的會晤、會談除了國務外，有關蕭邦的話題也拉近了他們私人之間的友誼。二〇〇二年，在摩納哥爲上海申辦世界博覽會時，李嵐清代表中國，那位副總理代表波蘭參加申辦，他們成了競爭對手。但一到摩納哥的蒙特卡羅，那位副總理就提出會見李嵐清這個老朋友，除了敘舊，其實是向李嵐清傳遞一個信息：如果波蘭提前出局，他這一票就投給中國。

二〇〇一年李嵐清帶隊赴莫斯科「申奧」。在「申奧」的關鍵環節，他宴請莫斯科市市長，請他幫忙爲北京「申奧」營造良好氛圍。這位市長也很喜歡音樂，他邀請李嵐清一起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並問他會唱幾段？李嵐清回答說：會唱四段。市長興奮地說：「現在俄羅斯的專業演員也只會唱兩段到三段，能唱四段的，可能也就是咱們兩人了。」音樂創造了一種融洽的信任感，兩人唱罷，市長拍着胸脯答應幫忙。

一本珍貴的木刻集

彭齡章誼

收到原魯迅博物館《魯迅研究月刊》常務副主編王世家簽贈的《顏仲木刻——中外文化名人肖像選集》時，不禁喜出望外。我們雖不懂木刻，但對木刻並不陌生，甚至還有些偏愛。記得小時最愛翻開父親負責編輯的《中蘇文化》和編譯的蘇聯作家寫的反法西斯文學作品，看裡面的蘇聯漫畫家庫克雷尼克賽的漫畫和畢斯克列夫、亞歷克舍夫等版畫家的木刻。知道父親當年在列寧格勒應魯迅之請翻譯了《鐵流》，並設法搜尋到魯迅珍愛的畢斯克列夫爲《鐵流》創作的原版木刻插圖。那是他爲魯迅搜集插圖和用中國宣紙換取蘇聯版畫家原揚木刻，即魯迅所謂的「拋宣紙之磚，引木刻之玉」的開始。

蘇聯版畫家的那些木刻，不僅眞實地反映了蘇聯十月革命初期社會與建設情況，也爲國內青年木刻家提供了借鑒。魯迅特意從父親寄回的一百多幅版畫中精選出六十幅，以「三閑書屋」的名義自費出版了《引玉集》，「以傳給青年藝術學徒和版畫愛好者」……所以，當我們收到這本古色古香的毛邊本的《顏仲木刻集》時，立即想起幼年時翻看蘇聯版畫家插圖的情景。

木刻大約起始於中國，正如魯迅所說「木刻是中國固有的」。早在唐代出版的《金剛經》就有《佛在孤獨園中說法圖》的木刻版畫，比歐洲現存的十五世紀的木刻聖母像要早幾百年。但它同西方的「聖母像」木刻一樣，失之呆板與程式化，不是藝術家富有個性與生命力的藝術創作，所以才「久被埋沒在地下了」。魯迅將其概括爲「中國的古刻」。而西方的「創作木刻」，即魯迅所說的「不模仿，不複製，作者捏刀向木，直刻下去」，「風韻技巧，因人不同」的「歐美的新作」，到十九世紀末，已發展到相當水平。魯迅把「歐美的新作」和「中國的古刻」看作是「中國新木刻的羽翼」，他說：「採用外國的良規，加以發揮，使我們的作品更加豐滿是一條路；擇取中國的遺產，融合新機，使將來的作品別開生面，也是一條路」。魯迅爲培育、發展「中國的新木刻」，傾盡了心血。在「禁錮得比罐頭還嚴密」的白色恐怖中，他一方面用手中如「匕首、投槍」般犀利的筆，在同反動派的文化圍剿奮勇戰鬥的同時，還積極地爲「中國的新木刻」的發展奔走呼號：他舉辦木刻講習班，爲《木刻創作法》一書作序並推介，與青年木刻工作者座談，出版歐美和蘇聯版畫家們的作品集，並多次以「三閑書屋」或「鐵木藝術社」名義，自費爲陳煙橋、劉峴、黃新波等青年木刻家出版《木刻紀程》、《無名木刻集》等選集。鼓勵中國青年木刻工作者們「不斷地奮發」，「一程一程地往前走」。

在魯迅辛勤培育、影響下，江豐、力群、曹白、陳煙橋、葉洛、劉峴、黃新波等新一代年輕的木刻工作者脫穎而出，成爲「中國新木刻」的拓荒者。魯迅逝世後，他們依舊沿着魯迅指引的路，「不斷地奮發」前進。抗日烽火燃起的時刻，李樺、馬達、賴少其、黃新波等年輕木刻家發起成立「中華全國木刻界抗敵協會」，積極投身於抗日救亡工作。在延安魯藝，在桂林、西安、重慶、北平，甚至在「孤島時期」的上海，「中國新木刻」拓荒者的隊伍不斷擴大，彥涵、古元、趙延年、伍必端……一批又一批版畫家「不斷地奮發」「一程一程地向前走」，爲「中國的新木刻」開拓了廣闊的前景。

顏仲應屬於新中國成立後培養的新一代畫家，浙江富陽人，一九五五年由中央美術學院華東分院畢業後，被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任美術編輯，而美編室主任恰是當年在魯迅倡導下，努力爲「中國新木刻」的發展拓荒奮進的老一輩版畫家、當年「鐵木藝術社」的骨幹劉峴。他在劉峴指導下學習木刻，特別是人物肖像畫創作，取得長足進步。一九五九年他創作的《魯迅像》，獲得美術界一致好評。人物肖像畫創作，比起風景、靜物要困難得多，更何況前輩多位版畫家都曾爲魯迅這位大家景仰又熟識的文學巨擘創作過木刻肖像，一位新手要想取得突破，更是難上加難。然而顏仲卻成功了。以往最爲美術界和廣大讀者認可的，是版畫家趙延年創作的《魯迅像》，但那幅《魯迅像》突出的是魯迅嚴肅、冷峻，「橫眉冷對千夫指」的一面，那幅木刻一出現，立即成爲其後的版畫家們創作魯迅像時的「樣板」，倣者蜂起，卻難出其右。然而，「橫眉冷對千夫指」僅是魯迅性格的一個方面，他「愛在大衆」，對人民，對親友，對廣大讀者，特別是青少年，更有「俯首甘爲孺子牛」的一面，顏仲創作的這幅《魯迅像》，未去單純倣倣前輩的創作，而是另闢蹊徑，創作出一幅親和、友善，凸顯魯迅「愛在大衆」的「俯首甘爲孺子牛」的精神，從而獲得一致好評。不僅入選當年舉辦的全國版畫展，二十二年之後的一九八一年，在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的紀念魯迅誕辰一百周年紀念大會的主席台中央，懸掛的仍是顏仲創作的那幅《魯迅像》。

然而，命運對顏仲竟是這樣不公。儘管在劉峴老師指導下，通過刻苦努力，取得大家公認的巨大成績，卻未能繼續他熱愛的事業。一年之後，由於「政治原因」和一批作家、詩人等文藝界人士一同放逐黑龍江，去哈爾濱一所中學任教。然而可貴的是，無論命運如何捉弄顏仲，他並沒有輕易放棄對藝術，特別是對肖像木刻藝術創作的追求。正如魯迅當年指導青年木刻習作者張影時所說：「只要不放手，我知道一定進步起來」。顏仲正是本着這「只要不放手」的精神，在教學任務繁重，工薪微薄，政治運動、特別是思想改造頻仍，精神上、生活上倍感壓力的情況下，依舊擠時間畫素描、練刀法，研讀可以找到的中外文化名人作品、資料、照片。他深諳魯迅「其實，木刻的根柢也仍是素描，所以倘若線條和明暗沒有什麼把握，木刻也刻不好」的主張，在他「捏刀向木」之前，對素描狠下過一番工夫。只要一得空，便對着資料、畫紙、木板反覆琢磨、比較，有時簡直達到痴迷的程度。據說他那幅《魯迅像》原版曾被用來蓋過酸菜缸，貧困潦倒到如此地步，以致他妻子也曾懷疑他這些不能當吃、不能當穿的畫作與木刻有什麼意義。即使如此，他卻依舊默默地用瘦弱的雙肩，支撐起心頭頑強的信念，本着「不放手」的精神，鍥而不捨，「一程一程地向前走」。直到一九八五年才在友人幫助下，調入哈爾濱畫院從事專業創作。

改革開放後，在市場經濟商業大潮衝擊下，不少「弄潮兒」都趨利而動。而顏仲卻依舊不迎合，不趨時，不顧稿酬低甚至被譏爲「守舊」，遭冷面、白眼，一直默默地堅守着魯迅關於「木刻以黑白爲正宗」的主張，把主要精力集中在他選定的中外文化名人黑白肖像木刻創作上。日復一日，花費近十年時間，創作出中外文化名人木刻肖像一百多幅。用他高超的技藝、嫻熟的刀法，生動地再現了魯迅、蔡元培、李大釗、郭沫若、茅盾、巴金，以及但丁、塞萬提斯、莎士比亞、托爾斯泰……等等人們景仰的中外文化名人的藝術形象，深受廣大讀者喜愛，也爲他贏得了國際聲譽。

正當顏仲日臻成熟，已逐漸形成自己獨特風格，正籌劃實施更龐大的創作計劃，其中包括自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與魯博商定在《魯迅研究月刊》上開闢專欄，連載他創作的《魯迅同時代的人》及《魯迅論及的外國文化名人》兩大系列人物肖像木刻的創作計劃，都因兩次開顱手術留下的嚴重後患而被迫中止。許多已畫出墨稿，尚未及「捏刀向木」的木板，也不得不堆積在櫥櫃裡。這對這位獨具風格的版畫藝術家來說，是多麼殘酷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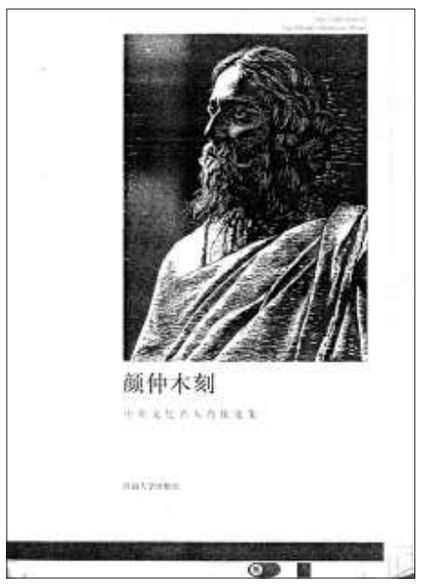
顏仲發病後，他的幾位友人：著名學者、中國魯迅學會名譽理事王觀泉，魯迅博物館研究員、中國版畫家協會理事李允經，以及王世家共同籌劃，爲顏仲編選一本較全面的畫冊傳世，作爲對這位傑出的人物肖像木刻家的紀念。

當我們捧着這本不尋常的木刻集時，深感它的厚重。

儘管我們對木刻技藝知之甚少，但細細觀賞中，還是可以深切感受到，顏仲創作人物肖像時，不只滿足於所刻人物外形的描摹，而着力表現他們的內心與個性。他嫻熟地變換使用圓口刀、三棱刀、平刀、斜刀等不同型號的刀具，或輕若繡花，精雕細描，層層刀痕，錯落有致，密到不可插針。連皮膚的紋路、質感都可感可觸；或大刀闊斧，恣意揮灑，條條刻痕，交錯縱橫，粗礪豪放，石破天驚；而如《丁玲像》、《巴金像》等，乾脆運用魯迅所說的「中國的古刻」常用的線描手法，就像用硬墨筆畫的素描。看似簡單，去蘊涵深意，凸顯畫主經歷的歲月滄桑、多乖命運，及他們寬廣、博大又剛烈如火的內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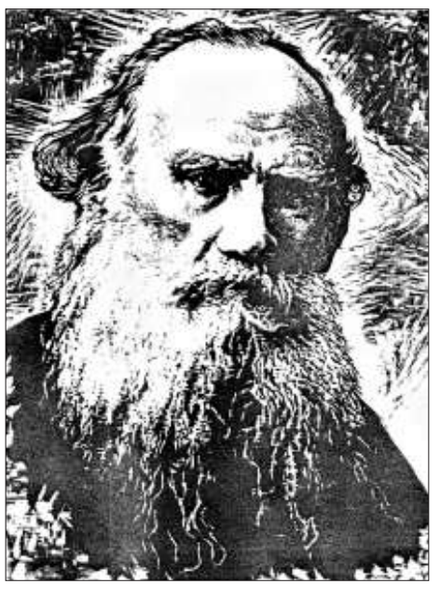
不由想起魯迅所說：「採取新法，加以中國舊日之所長，還有開出一條新路徑來的希望」，顯然，顏仲的黑白人物肖像木刻創作，在繼承、借鑒與創新諸方面，都取得了令人矚目的成就。正如魯迅所說：「那時作者各將自己的本領和心得貢獻出來，中國的木刻界就會發生光焰」。

顏仲自發病起，經過長達八年無常人意識的生涯，未能再取出他已出墨稿的木板，在工作台上繼續「捏刀向木」，也未及看到友人爲他選編的這本珍貴的木刻集的出版，就離開了。由於他生前處世低調，不尚炒作，至今無烜赫名聲。誠如王世家致我們信中所說：「但他給後人留下了一筆『文化遺產』，尚令人欣慰」，他在爲「中國的新木刻」，特別是黑白人物肖像的創作及中外文化藝術的交流上的突出貢獻，也是不應當被忘卻的。



《顏仲木刻》封面

魯迅像　顏　仲作



托爾斯泰像　顏　仲作

南京的冬天

谷萬中

過冬，南京人習慣在中間加個「老」字，戲稱「過老冬」，足見其份量。雖然位居江南，由於西北部北臨波濤滾滾的長江，無任何天然屏障可以遮擋，所以，每到北風呼嘯的冬天，南京的氣候曾經也十分寒冷。

記得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南京的冬天常會下大雪，雪片似鵝毛，積雪很厚，屋頂、樹梢、房前屋後的空地，到處白雪皚皚，好一派北國風光。因爲氣溫低，積雪常一連數日不化，並會出現大雪封門的狀況。遇有這樣情況，家中老人就會告誡說，雪不化的緣故，怕是在等她的伴兒呢，果然很靈驗，隔不兩天，就會又再來一場雪。雪景煞是喜人，瑞雪兆豐年嘛。可是，對於居住在危房裡的「草根」們，威脅就大了，爲確保安全，有時，人們還要用長竹竿，將屋頂上厚重的積雪清除掉一些。

在滴水成冰的時日，那些低矮屋簷，每個瓦槽的下部都掛上了冰錐，長長一溜排，十分壯觀。太陽出來時，屋面的積雪便開始融化，約莫下午四、五點鐘，氣溫又驟降，這一冷一熱的急劇變化，就是形成冰錐的物理條件。往往靠近窗口的屋簷下的冰錐體量最大，人們通常是將煤爐放在這裡，因此雪融化較快。最大冰錐的底部寬度達到二十厘米，最長的可達二百厘米。

不比現在，那時候，南京城的建築密度比較小，街頭、小巷邊，邊角角之處，留有許多空地，多爲泥土地，坑坑窪窪，凹凸不平，下雨後，時常會有積水，每到冬季，遇上雨雪天氣，氣溫驟降，就會結冰。大雪對人們日常生活帶來極大影響，而對於孩子們來說，卻是個難得的機會，下雪可以堆雪人，滑滑冰，玩玩冰塊，倒是很不錯的遊戲。

待到天空放晴，太陽露出笑容，在屋裡蜷縮了好長時間的娃兒們，早已按捺不住，便紛紛「出籠」。此刻，堆雪人、舞弄冰塊、玩耍冰錐，成了最熱門的活動，大家在冰面上滑冰，把一根根冰錐，小心翼翼地撬下來當衝鋒鎗使，追打奔跑，分外地開心。再把冰塊，一塊塊撬起，別出心裁地貼到人家的山牆上，用已經凍得發紅的小手將冰塊緊緊壓住，口中還唸唸有詞：「冰凍冰凍你上牆，我吃豬肉你吃牆，冰凍冰凍你上牆，我吃豬肉你吃牆……」反覆幾次，一塊塊形狀各異的冰塊，便「神奇」地粘在了牆上，甚是好玩。

那時候，不少居民生活拮据，尤其多子女家庭。平時吃得很差，常常吃稀的，「一吹三層浪，一吸成條溝」，就是這種情況的寫照。在冬季，爲了能夠節省開支，有人便使出了吃兩頓的「妙招」。

這期間正值學校放寒假，孩子們整天呆在家裡。天氣寒冷，家長乾脆讓孩子們蒙頭睡懶覺。早上拖到十點過後方起床，然後囫圇吃個早中飯，到下午四點多鐘，就匆忙安排晚餐。那時一般人家沒有收音機，沒有電視，生活單調，到了天際剛剛擦黑，又讓孩子們重新鑽入被窩裡。

賴被窩，吃兩頓，這可是個既省體力，又省電費（那時還有人家點油燈），還節約了糧食，可謂一舉數得。但是，這是個不得已的法子，它實在是苦了孩子。所以，那個時期的孩子，個個乾巴精瘦，「小胖墩」現象絕少發生。

一晃半個多世紀的時光過去了，隨着「厄爾尼諾」現象的發生和全球氣候變暖趨勢的形成，南京已經劃入了「無雪區」，記憶中的情景怕是難以再現了。往日的過冬情景，對於那些坐在溫暖的空調房間裡，把玩電腦遊戲的「小皇帝」們來說，是再也想像不到的事情；而對上了些年紀的人們來講，其間雖然略含些許辛酸，卻是挺有意義的回味呢。